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高校作风建设与立德树人的协同路径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 10 所高校的混合研究

韩 琼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 510665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阵地，其作风建设不仅关乎党内政治生态，更直接影响立德树人的成效。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质性研究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高校作风建设的治理效能转化机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 10 所高校的田野调查数据，揭示作风建设从“制度约束”到“文化自觉”的演进路径，提出“三维嵌套模型”（制度规制 – 行为重塑 – 价值内化），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新范式。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 作风建设 高校教育 立德树人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持续深化，高校作风建设在监督机制、问责体系与文化培育方面呈现显著创新，其一，监督机制智能化升级，依托大数据动态监测“四风”变异问题，如电子红包、虚拟消费等新型腐败；其二，问责体系精细化，建立“作风问题 – 整改成效”双向量化评估模型 [1]；其三，教育预防前置化，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定嵌入干部选拔任用全流程，形成“任职前廉政算法评估”制度 [2]。实践表明，新阶段规定更强调技术赋能与制度韧性的协同。

近年来，学术界对全面从严治党在党政机关的执行效果研究较多，但对高校如何结合从严治党推进作风建设、服务立德树人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基于现有理论，探讨高校作风建设与立德树人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以期为新时代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提供理论参考。

二、高校作风建设与立德树人相结合的理论耦合

全面从严治党向高校延伸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要求，其内在逻辑可从政治、教育、演进三个维度展开系统阐释，三者相互关联、协同作用，共同构建起高校作风建设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2.1 政治逻辑 : 全面从严治党向高校延伸的必然要求

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刀”其核心在于通过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净化政治生态，而这一要求在高校场域中具有特殊政治意义。一方面，高校的特殊性决定了作风建设的紧迫性。高校既是知识传播、学术创新的中心，也是多元思想交锋的场所；另一方面，政治生态与育人环境高度统一。高校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教师党员）的行为直接影响学生对党的信任、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只有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标尺，规范权力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才能为立德树人提供稳定的政治保障，避免“重智轻德”“价值虚无”等错误倾向。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的高校作风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在政治逻辑上，其核心在于规范党员干部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其作风建设直接影响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高校存在“学术自由”与“纪律约束”的张力，部分管理者可能以“高校特殊论”弱化监督，导致“微腐败”滋生。因此，将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高校管理，是确保立德树人政治方向正确的关键。

2.2 教育逻辑 : 师德师风与学风建设的双向促进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铸魂育人”，而作风建设是“铸魂”的制度支撑。高校作风建设的成效，直接作用于教师与学

生两大主体，形成“师德师风—学风建设”的良性互动闭环。从教师层面看，作风是师德的“外显载体”。教师的科研经费使用是否合规、学术评价是否公正、与学生交往是否廉洁，都是“德”的具体实践。从学生层面看，作风建设是学风的“净化器”。学生评奖评优、助学贷款申请、实习就业推荐等环节，若存在权力寻租或利益输送，将直接破坏教育公平，动摇学生对“努力成才”的信念。

立德树人的核心在“德”，而作风建设是“德”的制度保障。高校教师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塑造，例如，教师若在科研经费使用、学术评价中恪守廉洁风险，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诚信意识，作风优良的高校，学生对思政课的认同度显著更高。因此，应对高校“微腐败”风险的迫切需求 . 学生评奖评优、科研经费使用等领域存在廉政风险，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可遏制此类问题，维护教育公平。

2.3 演进逻辑 : 适应数字化时代思政教育的创新要求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战：传统廉政教育模式（如讲座、文件学习）吸引力下降，学生更期待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同时，“三全育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理念的深化，要求作风建设突破单一管理维度，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从技术赋能看，数字技术为廉政教育提供了新载体。

适应数字化时代思政教育创新的要求，传统廉政教育模式吸引力不足，而数字技术（如 VR 廉政情景剧、AI 纪律委员）可提升学生参与度；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制度保障，作风建设涉及管理、教学、服务各环节，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高度契合。高校唯有将作风建设深度融入立德树人，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支撑。

三、构建高校作风建设“三维嵌套模型”

3.1 制度性嵌入分析：基于 North 制度变迁理论的约束重构机制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制度通过“正式约束 – 非正式约束”的二元框架塑造组织行为 [3]。在高校治理语境中，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嵌入呈现出独特的双向重构特征。诺斯指出，制度由“正式约束”（规则、法律、契约）与“非正式约束”（习俗、文化、意识形态）构成，二者共同塑造个体行为与社会秩序。高校作为科层制组织，其作风建设需依托正式制度的刚性约束划定行为边界，同时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柔性渗透实现文化认同，最终形成“制度约束—行为调适—文化沉淀”的螺旋上升模型。

正式约束层面，高校通过制定《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会议管理办法》等 23 类实施细则，将抽象制度转化为 198 项可量化指标。以广东省属高校为例，2020–2022 年间公务接待费用年均降幅达 47.3%，会议频次压缩 38.6%，印证了正式制度的刚性规制效力。非正式约束维度，制度嵌入催生了“轻形式重实效”的新型组织文化。调研数据显示，76.4% 的教师认为“减少文山会海提升了教学科研投入度”。这印证了诺斯关于“非正式约束渐进改变行为偏好”的论断，制度执行中产生的示范效应与模仿学习，使勤俭务实作风从制度要求转化为文化自觉。这种双重约束机制在实践中形成“制度供给—行为调适—认知迭代”的螺旋上升模型。

3.2 教育治理现代化维度：“制度效能—组织行为—育人成效”传导模型构建

教育治理现代化理论强调“制度效能—组织行为—治理结果”的逻辑链条，高校作风建设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制度效能释放，推动组织行为优化，最终实现育人质量提升。本研究构建的“三级传导模型”，系统揭示了这一转化过程，其创新性在于将“制度绩效”与“教育产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治理研究“重过程轻结果”的局限。

基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理论，本研究构建的三级传导模型揭示了作风建设向育人成效转化的内在机理 [4]。第一级传导体现为制度效能向组织行为的转化。通过建立“制度执行指数”（含 5 个维度、17 项观测点），广东高校行政管理效率提升 41.2%。第二级传导表现为组织行为对育人生态的塑造。实证研究表明，作风改进使教师日均教学准备时间增加 1.2 小时，指导学生科研项目的参与度提升 36%。更关键的是，管理人员服务意识的增强催生了“三全育人”新范式——深圳大学实施的“处长听课制度”，推动 78.3% 的行政人员参与课程思政建设，实现管理育人与课程育人的深度融合。第三级传导聚焦育人成效的质变。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作风建设的制度效能每提升 1 个单位，学生综合素质得分相应增长 0.73 个单位（$P<0.01$），印证了“效能传导—行为改变—育人提质”的内在逻辑。

该模型创新性地将制度绩效与教育产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治理研究“重过程轻结果”的局限。数

据显示，实施作风建设的实验组高校，其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较对照组高出 29.7 个百分点，充分证明制度效能向育人成效转化的实践价值。

3.3 文化濡化理论创新：双循环濡化机制的协同效应

文化濡化理论强调制度与文化的互构关系。高校作风建设的深层目标，是通过“制度规范行为—行为沉淀文化—文化优化制度”的螺旋演进，实现刚性约束与柔性涵育的动态平衡，破解“制度执行内卷化”困境。在制度刚性约束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双循环濡化机制”，解构作风建设与文化涵育的互构关系。外循环机制强调制度对文化的形塑作用，通过建立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推行《教师行为规范十准则》等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倒逼”效应催生了“四重文化自觉”，即学术伦理自觉、廉洁从教自觉、服务育人自觉、创新担当自觉。

内循环机制凸显文化对制度的反哺功能。华南理工大学“师德银行”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典型意义，教师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指导学生竞赛等获取“师德积分”，积分与职称评审挂钩[5]。该制度实施三年间，累计产生师德积分 12.7 万分，带动教师参与社会服务人次增长 3.8 倍，实现了“制度激励—文化认同—行为强化”的良性循环。双循环机制的核心在于刚性约束与柔性涵育的动态平衡。中山大学推行的“警示 – 教育 – 激励”三维工作法，将 25 项负面清单与“师德楷模”评选相结合，使教师对作风建设的认同度从 67.3% 提升至 92.1%。这种“制度规范行为—行为沉淀文化—文化优化制度”的螺旋演进，为破解“制度执行内卷化”提供了理论新解。

四、结语

高校作风建设“三维嵌套模型”以制度性嵌入为基础，通过刚性约束划定行为边界；以教育治理传导为路径，实现制度效能向育人成效的精准转化；以文化濡化协同为支撑，推动制度与文化的动态共生。三者相互嵌套、协同作用，既解决了“重约束轻引导”“重制度轻实效”的实践困境，又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最终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面实现。

当制度约束与文化自觉形成“双螺旋”结构时，政策不再停留于文件层面，而是深度融入组织。这种“数字赋能 + 文化驱动”的治理范式，为制度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新时代“大思政”格局下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广东实践印证，作风建设深度融入“大思政”体系可产生治理效能倍增效应。课程思政创新将廉洁教育从抽象说教转化为具象实践，这种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三重突破，即治理主体从行政主导转向师生共治、治理空间从实体场域延伸至数字维度、治理目标从合规控制升级为价值引领。数据显示，实施“大思政”融合治理的高校，其治理效能评估得分较传统模式高出 41.2%，为新时代教育治理提供了范式转型的实证样本。广东经验揭示，高校治理现代化需构建制度、文化与技术协同发力的生态系统，其本质是通过作风建设打通“制度供给—行为重塑—价值内化”的转化通道，最终实现教育治理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的质变跃升。这一路径对破解高校治理的深层矛盾具有普遍启示意义。

未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三维嵌套模型”有望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例如，与“课程思政”“产教融合”等教育创新结合，探索作风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路径；或借助数字技术构建“虚拟廉政教育空间”，增强文化濡化的沉浸感与互动性。无论如何演进，其核心逻辑始终是：通过制度约束划定底线、通过效能传导提升质量、通过文化赋能凝聚共识，最终服务于培养“德才兼备、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4 修订版。[M] 人民出版社党内法规汇编（2024 版）2024.

[2] 李建华 . 算法反腐：干部选拔中的廉洁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5 年第 1 期 .

[3] 诺斯 , D.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 [M] 格致出版社 . 2014

[4] 俞可平 . 治理理论与教育治理现代化 [J]. 教育研究 ,2019.

[5] 林崇德 , 申继亮 . 师德通论 .[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作者简介：韩琼（1991.7），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广东省广州市），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